

## 美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研究

鍾鴻銘

本文旨在探究 1970 年代發生於美國卡納瓦郡的教科書爭議事件，此一引起全國性關注的爭議事件，在美國課程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首先從地理、歷史、文化等因素，探究爆發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背景因素。主要爭議從 1974 年 4 月開始，至 1975 年年初風波才漸趨平息。爭議期間，發生家長不讓子女上學、勞工罷工聲援、暴力攻擊等事件，最後甚至引來特定政治團體的介入。此一事件從表面上看，可能涉及宗教、階級、種族等因素，但如細究之則可發現，其實涉及更深層的生活型態、價值觀的衝突。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除使學生受教權益受到影響外，亦使教師因憚於引起紛爭，不願採用具爭議性的教科書及創新的教學法，同時使得美國教育氛圍漸趨保守。導致爭議的諸多問題，如教科書選用委員會的代表性與運作、親師溝通、課程與政治利益團體的介入等問題，皆值得吾人進一步省思。

關鍵詞：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課程史、新右派、新保守主義

收件：2019年2月1日；修改：2019年6月12日；接受：2019年6月27日

## **Kanawha County Textbooks Controversy Event in America**

Horng-Ming Jo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that occurred in Kanawha Cou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70s. This controversial event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history. The controversy in question began in April 1974 and lasted until early 1975.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pute, some parents did not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 strikes and violent attacks occurred, and specific political groups were involved. On the surface, this incident may have resulted from factors relating to religion, class, and ethnicity. However,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reveals deeper conflicts in lifestyles and values.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students' education rights,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also made teachers reluctant to adopt controversial textbook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de America's educational atmosphere more conservative. Many issues that have led to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Kanawha County textbooks—such as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operation of the text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deserve Taiwanese educators' attention.

Keywords: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curriculum history, new right, neoconservatism

Received: February 1, 2019; Revised: June 12, 2019; Accepted: June 27, 2019

## 壹、前言

Provenzo、Shaver 與 Bello (2011: 1) 曾謂：

就其定義而言，教科書是共識文件。它們廣泛流通，且假如成功的話，它們必然吸引眾多人士。是以，教科書審慎地以避免爭議。

然不管編製時多麼嚴謹與審慎，在課程史上，總不乏教科書所引起的重大爭議。例如，社會重建論者 H. Rugg 即曾在 1930 年代編製一套名之為《人及其變遷中的社會》(*Man and His Changing Society*) 的教科書。起初頗受學校及學生歡迎，但因其中間偏左的立場，加諸時代氛圍的轉變，導致保守人士群起攻之，終而退出教科書市場 (鍾鴻銘, 2006; Dorn, 2008; Evans, 2007, 2012)。

Rugg 的教科書爭議事件並非課程史上之特例，1974 年於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卡納瓦郡 (Kanawha county) 所發生的教科書爭議事件，亦是美國課程史上的重要教科書爭議事件，部分教科書研究者皆曾提及 (Apple, 1993; Giordano, 2003; Herlihy, 1992)。與 Rugg 教科書因政治因素而引起爭議不同的是，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涵蓋政治、文化、宗教、種族等複雜因素。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強度最強、亦是最激烈的教科書爭議事件 (Hillocks, 1978)，而且也是美國「文化戰爭」(culture wars) 的起源之一 (Evans, 2011; Hartman, 2013)。Clark (1975: 216) 亦認為，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可能是美國教育史上所曾發生對教科書最暴力的衝擊」。甚至有學者認為，因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強度之大已非其他教科書爭議可比，故可稱之為教科書戰爭 (Provenzo, 1990; Stack, 2011)。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讓吾人得以省思 Apple 所提出之官方知識政治學的問題，即課程知識是「誰的知識？」、「其來源為何？」、「誰能決定何者構成知識？」等問題，此類問題涉及的是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團

體間錯綜複雜、相互交織的權力網絡 (Stack, 2011)。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不僅成爲美國民眾、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同時亦導致學區教育董事會主席與該地區的教育主管辭職。Provenzo (1990) 認爲當代有關極端基本教義派與教科書檢查的爭議即是發端於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其次，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背後，其實涉及課程研究最深層的問題。例如，Kincheloe (1983) 即曾指出，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反映出晚近美國教育史各種事件中某些最複雜的問題，也就是相信學生家長有權決定學生所欲接觸的價值，與相信課程應當反映社會、文化與種族的多樣性，兩種主張間的價值衝突。事實上，這些價值衝突不是單獨存在於美國的教科書爭議事件中，而是普遍存在於各國的教育制度中。即便教育具有因地制宜的特性，但其間亦具有普遍的共性，教科書的大規模使用即是其中之一。在現代教育制度中，教科書堪稱是無所不在的，對於形塑今日的課堂教學，教科書具有決定性的角色，是故它所承載的課程內容往往容易成爲爭議的焦點 (Adler & Tellez, 1992; Woodward & Elliott, 1990)。本文的目的，即在透過美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解析，了解教科書爭議的本質，以供吾人省思與借鑑。本研究屬歷史研究，資料之蒐集至爲緊要。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可蒐集到之相關研究資料爲蒐集範圍，因國內尚無相關研究，故以各種西文著作、期刊及西文期刊資料庫爲主要蒐集對象，包括學者的研究著作，行政單位的調查研究，卡納瓦郡學生長大後對事件的陳述與研究、受抗議教科書作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等。相較於某些研究者因親身經歷此一歷史事件而有過多的情感投入，本文作者希冀能以較爲超然客觀的立場敘述案件發生的過程，以及事件中涉及之爭議及其本質。卡納瓦郡之所以會爆發教科書爭議有其一定的歷史文化等因素，故本文首先概述卡納瓦郡的歷史、地理與人口特徵。其次則是敘述教科書爭議事件發生的過程，其後則是解析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本質，最後則是探討此一事件的影響與啓示。

## 貳、促發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背景因素分析

如未先了解政治、經濟、文化彼此間錯綜複雜之交互作用關係，而欲直接理解諸如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此類的歷史事件，是極為困難之事（Stack, 2011）。McHenry（2006: 1）亦認為：「就像多數事情一樣，教科書爭議並非在真空中發生，它是 1974 年之前所做諸多決定的總合」。事實上，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敵對陣營間張力如此之大，確有其特殊的地理、文化、歷史等因素。如階級關係、鄉村與城市間關係、鄉村家長缺乏教育決定權所造成的疏離感、地區的文化史等，皆是造成嚴重對立不安的因素（Apple, 1993）。以下嘗試分析之。

就地理因素言之，卡納瓦郡為艾爾克河（Elk）與卡納瓦河兩河交匯之處，亦因卡納瓦河流經此處而命名為卡納瓦郡，而卡納瓦河之名又是沿用卡納瓦族印第安人之名而來。在南北戰爭之前，此處以產鹽為主。戰後，煤礦成為主要產業。卡納瓦郡位於所謂的聖經帶（Bible belt）上，在宗教信仰上被歸類為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亦即傾向於從字面義解釋聖經經文。卡納瓦郡總面積為 907 平方英里，郡內的查爾斯頓（Charleston）是西維吉尼亞州的州治所在，亦是該地工商業與政府的樞紐所在，同時亦是發生教科書爭議的主要地點（Mason, 2009）。就全郡而言，非白人所占人口比例極低，不到百分之一，且皆為早期移民的後代。在某些鄉村地區，受限於地理因素，長期以來自居於一隅，保有自己的生活型態，甚少受到外界影響。稍有能力的人皆遠赴外地謀生，留下者大部分為低薪、失業、教育程度較低者，不太願意接受變化。但隨著大眾傳媒的發達與道路的開闢，新興的價值觀與生活理念逐漸衝擊居民長期保有的生活型態。

就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1970 年代堪稱是 1960 年代之反動。1960 年代是個激進的年代，不同於受過戰爭洗禮、滿足於現狀的上一世代，戰後嬰兒潮長大後開始質疑並挑戰既有建制，所以如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同志權利運動等紛於 1960 年代興起。部分

的人在經歷各種激進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動蕩不安後，渴望重新回歸秩序與穩定之心油然而生，於是反抗世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重新尋回舊有傳統價值，成了某些人的共同主張（Kincheloe, 1983; McHenry, 2006）。此外，在民權運動期間，少數種族團體與婦女要求在教科書與文學選集中放入更多相關的文獻。此種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亦為此後右派的教科書檢查運動埋下導火線（Pincus, 1985）。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爆發前不久，此地亦曾發生性教育課程抗議事件。1969年，「學校健康教育研究」（School Health Education Study）的研究組織，在聯邦教育署（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的支持下，選擇卡納瓦郡實施一項從幼稚園以迄十二年級的健康與家庭生活教育課程實驗計畫。初期預備在四所小學、兩所初中與兩所高中實施。此一教育計畫亦獲得卡納瓦郡教育董事會與課程諮詢委員會（Curriculum Advisory Council）的認可。但消息披露後，反對團體開始出現，在對課程材料進行審查後，彼等認為此一實驗課程計畫的課程材料具有無神論、反基督教、反美國的特性，而且違反倫理道德。就性教育角度言之，從1970年代的性教育計畫開始，許多卡納瓦郡居民即反對課程中提及變遷中的性規範、婦女解放、同志權利等議題。反對者亦相信性教育會破壞傳統的家庭，且導致學生性活動的增加。其次，彼等亦反對性教育計畫中有關道德推理的教學，以及減少閱讀聖經的時間與禱告的行為。反對者以為，聖經登載的是上帝之言，是道德的絕對法則，但性教育計畫教導的卻是情境倫理學，認為道德是一種社會習俗，是一種社會建構，是故可以加以改變。A. Moore女士是反對性教育計畫的領導者，其登載在反對傳報中的言論，或能代表反對者的心聲。Moore認為性教育計畫是對「上帝的否定，且以環境為基礎推論出對與錯的人文主義取向是對上帝的否定。上帝法則是絕對的」（引自Candor, 1976: 30）。

在數個草根團體的反對下，最終該課程計畫並未在卡納瓦郡實施。「許多對語文教科書內容的抗議，已直接預示於1969至1970年的性教

育爭議之中」(Candor, 1976: 28)。或言之,「此一審查作為是 1974 年事件即將來臨的前兆」(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75: 39)。Moore 女士因反對性教育計畫挺身競逐教育董事會委員乙職。她挑戰的是競選連任的 C. Tully 博士。Tully 是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 教育理念的信奉者,但最終卻敗給保守主義的 Moore。「選戰期間有關性教育爭議的性質保有與 1974 至 1975 年教科書抗議驚人的相似性」(Candor, 1976: 28)。Moore 不僅因成功阻擋此次性教育計畫而獲選為教育董事會委員,4 年後她亦再次主導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

此外,教科書爭議發生前一連串的學校、學區整併,亦是影響因素。由於學校、學區的整併過程中並未讓家長參與決策,且一連串的整併使得長期位居社區中心且為家長所控制的學校,逐漸成為科層體制的一環且漸為專業人員所控制,此使得鄉村地區的家長漸與學校產生疏離,認為自己的聲音不再受到教育主管單位的重視。透過教科書抗議活動,他們希望自己的聲音能被聽見 (Candor, 1976; Stack, 2011)。

## 參、爭議過程

### 一、爭議的緣起

一如美國各地的教科書選用,卡納瓦郡亦組有教科書選用委員會負責教科書的採用。卡納瓦郡教科書委員會由 5 人組成,其中小學教師 1 名,初中與高中教師各 2 名。另有由初、高中各 6 名教師所組成的中等學校教科書次級委員會與由 8 名小學教師所組成的小學教科書次級委員會。依慣例,卡納瓦郡通常以 5 年為週期,輪流評選不同科目的新版教科用書,以供學校在新的週期使用。1974 年適逢語言與英文類教科書的評選作業。根據該州法律規定,地方學區僅能根據該州所核可的書單中進行選書,同時州法律亦規定,選定的教科書應能充分顯現美國為一多元文化社會,以及不同種族對美國歷史所做的貢獻 (Seltzer, 1974)。1974

年 2 月底教科書委員會完成最終的評選，並且提交 325 本語言與英文教科書的建議書單給教育董事會，以便在新學年度開始使用。這些教科書包括希斯公司（Heath Company）的《溝通與語言動力學》（*Communicating and Dynamics of Language*）等教科書，以及麥克道格李帖爾（McDougal Littell）公司的《人的語言》（*Language of Man*）等補充讀物（Foerstel, 2002）。為便於讀者易於理解，茲將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發生過程，整理成表 1。

3 月 12 日的教育董事會，在 Moore 未出席的狀況下，教育董事會決定依程序將獲選的教科書公開供民眾閱覽並蒐集意見。於是 3 月 14 日至 4 月 11 日期間，獲選的教科書於查爾斯頓公立圖書館公開供民眾閱讀，但展示期間幾乎無人閱覽。4 月 11 日，教育董事會召開會議準備審核這些教科書，會議期間，Moore 女士對部分教科書內容有疑慮，她甚至指稱這些教科書為「垃圾」。她並指出，董事會成員與一般民眾的公開閱讀時間過於短促，無法仔細審視教科書的詳細內容。迫於時間因素，委員會還是通過決議採用這些教科書，不過在 Moore 的要求下加入但書，即將來如發現教科書有可議之處，教育董事會得將其自書單中移除。Moore 在抱怨部分教科書內容的同時，亦認為董事會應加強控制教科書的選擇。在同一會議上，教科書選用委員會的主席 N. Wood 女士則為獲選的教科書辯護。此外，亦有另一位董事會成員 M. Kinsolving 對教科書有所保留。5 月 16 日教科書選用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交選書所依據的原理，董事會並決議 6 月 27 日為教科書的最後決定日（Goode, 1984）。

能言善道的 Moore 女士是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核心人物，曾居住於北卡羅尼那州（North Carolina）、田納西州（Tennessee）、阿拉巴馬州（Alabama），1967 年甫從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移居至卡納瓦郡，其先生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教會牧師（Faigley, 1975; Mason, 2009）。她是住在卡納瓦郡郊區的中產階級，並未完成高中學歷，但就教育政治學而言，卻是個權力人物，且善於操控媒體（Humphreys, 1976）。亦有人



謂其政治上極為精明，能善用女性特有的氣質。她口才便給，談話時具有權威的口吻，即便是常春藤名校畢業者，在其犀利的詰問下，有時亦僅能三緘其口（McHenry, 2006）。Moore 女士的夫婿 Moore 牧師曾閱讀過部分獲選的教科書，且針對內容與其夫人討論，此進一步引發 Moore

表 1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過程表

時間	重要事件
1974 年 2 月底	教科書委員會完成語文類科教科書評選，向教育董事會提交 325 本教科用書
1974 年 3 月 12 日	董事會決定將獲選教科書公開供民眾閱覽並蒐集意見
1974 年 3 月 14 日~4 月 11 日	教科書於查爾斯頓公立圖書館公開供民眾閱覽
1974 年 4 月 11 日	Moore 女士質疑部分教科書內容，董事會對於通過審核教科書有所保留
1974 年 5 月 16 日	教科書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交教科書選用原則，董事會決定 6 月 27 日為教科書最終決定日
1974 年 6 月 19 日	卡納瓦郡親師會開始攻擊教科書
1974 年 6 月 27 日	董事會 3 票對 2 票決議，除 8 本補充讀物外，採購其他所有教科書
1974 年 9 月 3 日	開學日，部分家長發起抵制，不讓子女到校
1974 年 9 月 10 日	抗議人士癱瘓大眾交通運輸
1974 年 9 月 11 日	董事會同意暫時移除教科書 30 天
1974 年 9 月 24 日	新成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開始審查教科書
1974 年 10 月 15 日	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同意恢復使用教科書
1974 年 11 月 8 日	董事會 4 票對 1 票通過，除 36 本爭議性教科書外，其餘著作恢復採用
1974 年 11 月 12 日	州警力與卡納瓦郡警力共同合作恢復社會秩序
1974 年 11 月 21 日	董事會通過教科書選用指導綱要
1974 年 12 月 3 日	法院駁回抗議者的司法訴訟案
1974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1 日	全美教育協會受邀至卡納瓦郡進行調查
1975 年年初	爭議漸趨平息

女士對教科書的關注 (Stack, 2011)。當她閱讀部分教科書後，發覺部分內容有褻瀆上帝、反愛國心、非白人、不道德、粗鄙不堪的現象。於是她將閱讀心得與該郡其他教會牧師分享，部分人士認為並無不妥，但亦有人深覺同感，於是她要求在郡內教會公開展示這些教科書。5 月底至 6 月，Moore 女士的談話被地方報紙一再地引述，她亦多次在教會與社區組織展示她所反對的教科書內容。

6 月 14 日抗議者欲參與教育董事會的會議，但因未達法定人數而未能開會。6 月 19 日卡納瓦郡親師會 (Kanawha County Council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的執行董事會開始攻擊部分獲選的教科書，認為這些教科書有反美國、反宗教與歧視的內容。親師會主席 L. W. Seaman 即曾謂：

許多書本實質上充滿著反美國主義、反宗教與歧視。可怕的是這些書本亦缺乏道德向上提升的觀念。許多的陳述蔑視法律與秩序，以及對權威的尊重。數個篇幅在性的方面極為露骨。(引自 Candor, 1976: 66)

學校教師則較為支持獲選的教科書，某位中學教師曾投書地方報刊表達支持的立場：

這些書本象徵注視美國與世界生活的所有面向。有著山丘的美景，同時亦有著貧民區的痛苦與絕望。Moore 女士認為吾人理應展示美國的美景而非醜陋之處，也就是吾人唯應呈現中產階級的白人社會觀。我則認為吾人不能遮蔽中產階級兒童。吾人不能忘卻貧民區的弟兄，不能簡化世界的圖像。身為教師的我們，對專業人道主義負有責任。在民主的利益下，吾人必須呈現所有人與所有人類境況的真實圖像，否則將使兒童屈從於偏見、叛逆、刻板印象、主觀性與無知。(引自 Candor, 1976: 56-57)

在某次會議中，有人用錄音帶錄下 Moore 女士的談話內容，此一錄音帶在卡納瓦郡廣為流傳。Moore 女士的言行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且選擇加入反對陣營。在教科書反對者提高聲量的同時，力挺教科書的聲音

亦開始出現，雙方的對抗隨即爆發。反對者散發傳單，指責某些教科書內容淫穢，提倡共產主義，甚至讓人覺得宗教有愚弄信仰者之嫌。有色人種權利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的官員公開指出教科書內容甚佳並無欠妥之處，西維吉尼亞人權委員會（West Virgin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亦支持獲選的教科書。即便是在教會牧師之間亦有不同的評價，有些牧師認為內容並無不妥，但基本教義派屬性的牧師則認為有違反道德之嫌（Goode, 1984; Watras, 2014）。

6月27日教育董事會舉辦公聽會，並最終決定是否購買已通過核可的教科書。有超過1,000名受到Moore女士影響的公民參與此次公聽會，他們大多數人佇立在大雨滂沱中觀看整個會議議程。經過三小時的熱烈爭辯後，董事會以3票對2票的投票結果決議，除8本補充讀物外，採購所有具爭議性的教科書（Foerstel, 2013）。事實上，投贊成票的董事會成員亦曾針對反對者所提出的理由進行答覆（Mason, 2009），但即便如此，在公聽會決議之後，隨著有關爭議教科書內容文宣的廣泛流傳，教科書爭議隨即進一步擴大。部分教會牧師甚至倡議在公立學校之外，另行成立私人變通學校或教會學校，以供學生與學生家長選擇。

## 二、爭議的擴大

9月3日學校開學，一個自稱為「關心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s）的家長組織發起抵制活動，不讓子女到校就學（Goode, 1984）。該郡45,000名學生約有20%缺席，正常情況應是8%的學生未能到校。同時約有3,500名的礦工進行非法罷工表示聲援，不久之後抵制的行動蔓延至商業活動及鄰近地區。9月8日出席率進一步下降至77%，Moore女士亦要求卡納瓦郡學監K. E. Underwood必須辭職以示負責（Parker, 1975）。在抵制學校期間，摘錄自教科書內容的新傳單開始流傳，部分內容甚至與教科書全然無關。這些傳單使得教科書爭議進一步擴大。抗議者從反對部分

教科書內容，轉而反對全部獲選的教科書，甚至一些經典的名著，如 Plato 的《共和國》（*Republic*）亦遭波及（Foerstel, 2002）。

9月10日抗議人士癱瘓該郡的大眾交通運輸，讓上萬民眾無法搭乘交通工具。9月11日在抗議的浪潮下，教育董事會妥協，同意先移除教科書30天，以供民眾審視教科書內容（Parker, 1975）。到9月12日煤礦公司估計損失200萬美元，9月27日學校官員估計有30萬美元的損害。

不僅教科書支持陣營與反對陣營彼此相互叫囂，暴力行爲亦時有所聞，甚至有人遭到槍擊。學校被肆意破壞，有些建築物甚至被貼上三K黨（Ku Klux Klan）及納粹（Nazi）標記。有些汽車遭到焚毀，學校校車受到槍擊，甚至教育董事會的建築物亦遭到爆裂物襲擊。學監、董事會成員，以及試圖讓小孩到校的家長皆成爲暴力攻擊的對象。憚於暴力行爲，卡納瓦郡的學監 Underwood 宣布學校關閉一週。此一舉措反倒激勵抗議者。在更激進的要求被否決後，抗議者封鎖董事會辦公室的入口，而且有三所小學遭到爆裂物攻擊。但抗議者更爲激進的行爲，讓原本反對教科書的保守中產階級開始感到疑懼，認爲整個事件已經失控。在此期間，董事會有意尋找妥協方案，而 Moore 女士亦開始感受到事態發展已非其所能掌控，但當 Moore 向民眾提出妥協方案之時，卻遭抗議民眾噓聲以對。

地方警察局長，眼見局勢難以控制，曾要求州長調派警力前來支援，但州長以州不應介入地方政治事務爲由加以拒絕。在折衝過程中官方同意設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Textbook Review Committee）於9月24日開始審查工作。審查期間，亦有多個團體持續介入教科書爭議。如「商業與專業人士追求更佳教科書聯盟」（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Alliance for Better Textbooks）、屬保守派思想智庫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皆極力反對教科書。但另一方面卡納瓦郡教師協會（Kanawha County Association of Classroom Teachers）則反對撤除教科書，且譴責董事會面對公眾壓力時放棄其應擔負的法律職責（Moffett,

1988)。10月10日董事會成員 A. Anson 宣布辭職，理由是無法接受良好的教科書被摒除於校門之外。隔日，卡納瓦郡的學監 Underwood 亦宣稱已在另謀他就。教科書審查委員會於10月15日完成教科書審查工作，贊成讓教科書回歸校園，但附加兩項指示。其一，若家長有告知學校其反對某一教科書者，其子女可不在課堂上閱讀該書。其二，董事會應禁止教師向學生灌輸其家庭所反對之價值。學校董事會亦要求此後教科書之採用，應有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之審議過程。任一學科的教科書審議委員會皆由3位家長與1位教師組成，且須有四分之三的委員贊成方可採用（Watras, 2014）。

11月8日學校董事會在 Moore 投下反對票的情況下，以4票對1票通過，除了較具爭議性的36本著作外，其餘著作恢復採用。11月12日州警政單位總算答應與卡納瓦郡的警力配合，共同恢復法律與秩序。11月21日董事會通過一份指導綱要，作為未來選擇教科書的依據。此一指導綱要乃根據著名教科書審查工作者 Gabler 夫婦寄給 Moore 女士的要求標準而制訂。其要義大致如下：

- 一、卡納瓦郡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應該承認家庭的神聖性，且強調它作為美國社會基本單元的重要性。
- 二、教科書不可藉由詢問學生或其家長的內在情感或行為，侵犯學生家庭的隱私。
- 三、教科書不可有褻瀆之處。
- 四、教科書不可鼓勵提倡種族仇恨。
- 五、教科書必須鼓勵對美國的忠誠與公民的責任，且有義務透過法律程序糾正不平等。教科書不可鼓動暴亂或革命以對抗政府，或是教導或暗示外國的政體較為優越。
- 六、教科書應該教導課程中所欲研究之美國與其他國家真正的歷史與資產。教科書不可詆毀國家的創建者，或是扭曲他們努力以赴或為之犧牲的理想或理由。（Crawford, 2011: 59; Provenzo, 1990: 23）

12月3日聯邦法院駁回兩位人民的控告，渠等以違反其宗教信仰爲由，要求禁用卡納瓦郡所通過的書籍。此一判決，挫敗了從法律層面所提出的挑戰（Fikes, 1991）。抗議期間，亦有部分基本教義派神職人員因過激的行爲遭到司法制裁，如 M. Horan 牧師因意圖炸毀學校而被判刑三年，E. Graley 和 A. Hill 則因違抗法院律令而被短期監禁。隨著爭議的擴大，卡納瓦郡逐漸成爲全美與國際新聞關注的焦點。成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60分鐘」（60 Minutes）新聞雜誌以及最大的談話性節目唐納修（Donahue）談論的主題。

### 三、利益團體的介入與爭議漸趨和緩

全美教育協會在卡納瓦郡教師協會的請求下，組成 10 人小組於 12 月 9 至 11 日到卡納瓦郡進行調查，並於 1975 年 2 月 6 日提交調查報告。報告指出，極右派團體的介入，是此次爭議密度之強與期間之長的主要原因（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75）。在整起事件過程中亦有課程與政治利益團體的介入。早在 4、5 月爭議期間，Moore 即開始與著名的教科書審查者 N. Gabler 與 M. Gabler 夫婦接觸。自 1960 年代初開始，Gabler 夫婦即將所有心力投注於教科書內容的探究。10 月初在 Moore 的邀請下，Gabler 夫婦曾到卡納瓦郡向群眾演說，在演講中彼等表示，使用不受節制的教科書，無異於心智上的自殺（Giordano, 2003）。就在全美教育協會調查小組到卡納瓦郡進行調查的同時，另一極端團體三 K 黨亦抵達卡納瓦郡支持教科書抗議行動，並且在地方廣播電臺探討相關議題。由於此一極端團體的出現，使得地方上較激進的抗議團體亦深感不安，於是到了 1975 春天來臨之際，較情緒性的集合已不復見，礦工的罷工行動亦已結束，大部分有爭議的教科書亦已重返學校（Foerstel, 2013）。卡納瓦郡學監 Underwood 任期本應到 1975 年 6 月 30 日，但是他宣布提前離職，並於 2 月 1 日生效，其職位由 J. F. Santröck 接替。

整起教科書爭議事件隨著 1975 年的到來漸趨緩和。日趨和緩的原因

除了三 K 黨等極端團體的介入使人產生疑懼，亦有可能是逼迫教育董事會建立教科書評審委員會，讓最具爭議性的教科書退出校園，並讓董事會官員辭職，使抗議者自認獲得實質性的勝利而心生滿足，抑或可能是嚴酷的冬天氣候使得群眾不易聚集（Mason, 2009, 2011）。此外，1975 學年度，學區內亦成立多所私立教會學校，吸引約 2,000 名學生前往註冊。這些新成立的教會學校，使得當初抗議時的主張，即成立公立的變通學校，不再有付之實現的必要（Page & Clelland, 1978）。將教科書抗議者的主要訴求與反對理由整理成表 2。表 3 則是將卡納瓦郡所屬的南阿帕拉契俗民文化（Southern Appalachian folk culture）與美國中產階級文化屬性做一比較，以助於理解教科書抗議者的文化特性與價值觀。

表 2 教科書抗議者的主要訴求與理由

爭議項目	訴求內容
性教育	反對性教育。性教育導致青少年的性混亂與性活動增加，使家長喪失保護其子女免受環境不良因素污染的權利。反對提倡婦女解放、同志權利、新的性道德觀。
多元文化教育	教科書強調種族的多樣性是反美國的。教科書過多地呈現黑人與白人相爭的歷史，易助長學生種族仇恨之心，無助於形成共同的國家認同。相反地，彼等認為教科書應有助於培養愛國的心志。彼等聲稱反對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並非基於種族因素，而是反對書中提倡的道德主張與生活方式，認為家長有權利不讓其子女接觸這些內容。主張教科書大多呈現少數民族的觀點，較少出現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
宗教	對於上帝的存在不允許有任何的質疑，反對教科書中不敬上帝、貶抑基督的內容。主張上帝而非人，是真理與道德標準唯一的來源與制訂者。主張道德絕對主義、反對道德相對主義或情境的倫理觀。反對將道德描述為可任意改變的社會習慣。反對價值澄清法、道德兩難式教學、展示與講述教學法（show and tell method）。
語言與文學教育	主張教導標準的英文語法，反對教導方言、少數民族用語或街頭用語，彼等不認同此類教學內容有助於化解代溝。反對「看與說」（look-say）的新式英語教學方式，支持傳統的語音法（phonetic approach）教學。

表 3 卡納瓦郡所屬南阿帕拉契地區俗民文化與美國中產階級文化特性比較表

南阿帕拉契俗民文化特性	美國中產階級文化特性
人從屬於自然與上帝；難以控制其命運；宿命論	人能控制自然；對人的處境較為樂觀
堅定依附於傳統	變遷與進步的思維；期待往好的方向變化
傾向於存在之事物	傾向於進步
不認可專家的意見	認可專家的意見
家庭與外在世界的分離	家庭是連接外在世界的橋樑
對教育抱持模擬兩可的態度	重視教育
對醫生、醫院、受過良好教育者懷有恐懼感	願與醫生、醫院與「外在者」合作
對政府與法律具有敵意	利用政府與法律達成目標
對外在世界心存疑慮與恐懼	接受外在世界
個人想法與感覺先於團體目標	團體目標先於個人目標
成人中心、男性支配的家庭	兒童中心、雙親共同決策的家庭
焦慮感	自信感
對長期細心的規畫不感興趣	事前細心規畫的欲望與能力
運用具體的事例	運用觀念、理想與抽象作用
強調傳統的男子氣概	不重視男人特性
現實導向，緩慢的自然節奏	未來導向，快速的節奏

資料來源：整理自 Candor (1976: 14-15) 與 Goode (1984: 51-54)。

註：西維吉尼州位居阿帕拉契山南端，有其獨特的南阿帕拉契次文化，特別是鄉村與孤立的區域更是明顯。

## 肆、事件成因探討

事件發生雖已逾四十個年頭，但一直以來皆有學者嘗試探究發生教科書爭議事件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事件的見證者，事後針對此事件進行深入探究 (Mason, 2009; Means, 2010; Priest, 2010)。對於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評論者有的對抗議者表示支持，有的則站在反方，認為抗議事件將會為公共教育帶來威脅。亦有人視其為文化戰爭的開始 (Watras, 2014)。McNearney (1975) 曾探討抗議者反對教科書的各種理由或原因，



並將其劃歸為四類。首先，他們反對褻瀆不敬的言語。其次，他們反對教科書中出現的俚語、街頭談話用語，以及拙劣的文法。再者則是教科書有關性教育的部分。最後則是將上帝的存在當成是神話，而此部分 McNearney 認為是引起爭議的最重要原因。Page 與 Clelland (1978) 在檢視完抗議者公開陳述的內容與抗議傳單及手冊的內容後，將彼等的不滿劃歸為四類。首先是不尊重上帝與聖經傳統的正統觀念，其次是使用褻瀆與粗俗的語言，再者是不尊重權威，最後則是提倡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Hillocks (1978) 在看過反對者的數百種理由後，亦認為可簡化為幾種範疇，其中有兩項特別重要。其一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反對與破壞。其二是對社會病態與暴力的過度關注。Stack (2011) 曾謂：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是關於自我、認同、社群、階級、種族、性別、地方，且最終是價值的爭議。依 Stack 之意，從表象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涉及宗教、階級、種族等問題，但背後涉及的是更深層之價值衝突的問題。

## 一、宗教、階級、種族等表象因素的探討

打從一開始，抗議的家長曾堅持教科書爭議是宗教或神學的問題 (McNearney, 1975)。除了對上帝堅定不移的信仰與反對褻瀆的語言外，教科書抗議者堅信道德絕對主義 (moral absolutism) 而反對道德相對主義。

教科書抗議者是一貫的道德絕對論者，彼等堅持可以透過上帝與聖經發現真理。真理從不變化，亦不依賴於環境，而且個人應將其生命奉獻給上帝絕非難以理解之事。依 Moore 之言，「上帝為是，其餘皆非」，是以，有關課程的爭辯是不必要的。……凡屬上帝者皆應包括在內，凡非上帝者則不應含括在內，「真正的」基督徒明白其間之差異。(Kincheloe, 1983: 30)

除了宗教因素外，亦有人嘗試從階級衝突的角度進行解釋。例如，Fikes（1991）從卡納瓦郡鄉村與都市人口間社經階級的劃分，解釋此次教科書爭議。此種解釋方式，隱含有階級衝突的意涵。Burress（1989）亦是從中產階級與較低階級間的衝突，闡釋卡納瓦郡爭議事件。概括而言，支持教科書者大部分為中產階級，以卡納瓦郡地理環境而言，彼等大部分居住於艾治伍德（Edgewood）與南山丘（South Hills）較富庶的一帶，從彼等之住所可以俯視城鎮地區，在教科書爭議期間媒體慣以山丘居民（hillier）稱之，這些人約占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二。次要富饒地區則是在城鎮東端，此處是官方機構的主要集中地。城外的坎貝爾溪（Campbell Creek）一帶則是鄉村社區，居民多為貧困的勞動階級，許多人因在礦廠工作之故而得有肺病，人口約占當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皆屬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抗議期間，許多抗議總部大都建立於此，抗議期間，媒體慣以小河居民（creeker）稱之。部分抗議事件的解析者，即是從「山丘居民」對「小河居民」階級衝突的角度解釋此次的教科書抗議事件（Mason, 2009）。Billings 與 Goldman（1979）亦主張從階級衝突的角度進行解析，認為卡納瓦郡教科書抗議者反抗的是優勢階級對彼等所強加的新支配型式。階級鬥爭雖是常見的解釋，但是因素可能更為複雜。Stack（2011）即曾指出，媒體通常將此事件描述為僅僅是一種階級鬥爭，受過教育且支持教科書的中產階級或是山丘居民，對上教育程度較低之鄉下的、勞動階級窮人或是小河居民。階級的確是重點，但仔細審視事件卻顯示出更深的複雜性。

除了從宗教、階級的角度進行解析外，亦有學者關注到衝突的種族面向。全美教育協會調查小組在調查過程中，部分教師談及家長曾抱怨教科書中有關種族的議題。另亦有居民於建築物牆壁漆上「黑人著作滾蛋」的字樣（Fikes, 1991）。之所以陷入種族爭議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少數團體的文學作品皆名列教科書抗議者所列的抗議清單中。Moore 等抗議者曾否認自己為種族主義者，彼等並指出渠等所反對的是作品中涉及的

道德立場，而非作者身分。教科書的選定固然是依據增進不同族群間相互理解的多元文化主義原則，但 Moore 本人則認為，教導種族相互理解的結果，反倒製造種族仇恨。彼意以為，學校應忽略族群的問題而聚焦於美國主義。其次，少數團體文學作品中對於貧民區生活型態的敘寫，Moore 亦難以苟同，認為家長有權利不讓其子女接觸彼等所不認同的生活型態 (Kinchloe, 1983)。再者，獲選的某些黑人著作談及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亦引起教科書抗議者的不悅 (Hartman, 2013)。

## 二、生活型態、價值觀衝突等深層因素的探討

宗教、種族、階級等表面衝突，其實涉及的是更深層次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衝突。社會學者 Page 與 Clelland (1978) 即是從生活型態之爭的角度詮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

吾等相信生活型態關懷政治學是鉅型的觀念，其可被應用至所有非經濟信念系統的鬥爭之中。此種鬥爭並非總是可以化約至經濟衝突，但對日常政治卻是重要的，其理由至為簡單，即人是依符號的觀點組織其世界的符號動物。唯有某種生活型態的附隨者能對其社會化與社會交流的手段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時，此種生活型態才得以被維持與增生。當逐漸消失的多數者因為喪失此種控制權而認知彼等的生活方式在式微之時，生活型態的關懷便至為明顯。但人數漸增的少數者同樣投入此種文化保護與支配的鬥爭之中。(Page & Clelland, 1978: 267)

基於此一立場，Page 與 Clelland (1978) 認為事件的抗議者是某種生活型態與世界觀的附從者，彼等發現其生活型態正遭受來自教育系統、大眾傳媒等社會化機構的入侵與威脅，故思有以反制之。Page 與 Clelland (1978) 認為抗議事件絕非只是回應經濟剝奪或是莫名挫折之非理性、替代性的攻擊，而是試圖建立並維繫某種道德秩序，以替其生活提供基本意義。職是之故，以為：

教科書爭議可以解釋為某種生活型態議題之爭，此乃因雙方的參與者皆視其為信念與生活方式的衝突，且經濟與聲望的議題皆非此一衝突的主要因素。(Page & Clelland, 1978: 267)

或者歸而言之，「教科書爭議是再製『生活方式』衝突的結果」(Clelland & Page, 1980: 281)。

全美教育協會調查小組的報告書亦是從文化衝突的角度進行解釋(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75)。文化衝突解釋的好處是避免將責任歸諸任一方。Watras (1975) 認為將事件的原因歸之於勞動階級的法西斯主義傾向與種族主義者，忽略了美國各地大學教授與企業領袖所具有的保守主義與種族主義傾向。其次，將事件歸因於文化衝突者，則未能幫助吾人公平地處理價值的問題。Watras (2014) 認為文化衝突固然是普遍被接受的觀點，但是仍然存在其他的可能解釋因素。例如，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也代表著專家社會的失敗，也就是教育專業管理階層在形成政策時，未能與一般大眾做好溝通工作。其次，教科書呈現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式有值得商榷之處，也就是教科書在呈現不同種族成員時，將彼等視為由其文化所決定之人，故充滿著各種刻板印象。Watras 本人選擇從 M. Greene「學習景緻」(landscapes of learning) 的觀點提出解釋。「學習景緻」旨在說明人們如何形成各種觀點，而這些觀點會進一步塑造其行為與態度。根據「學習景緻」的概念，指出：

在卡納瓦郡中，爭議的型態是各方的成員都緊密的抱持一種特殊的景緻，且同樣將狹隘的觀點投射在敵對陣營的成員身上，且拒絕考量其他的替代選項。家長宣稱有權根據自己的標準養育自己的小孩，且有必要抗拒外在的影響。教育工作者尋求使用經專家認可材料的學術自由，且認為有必要向兒童介紹其他種族團體的成就。不同陣營的倡導者，不去尋求整合這些目標的方式，反倒藉由扭曲所遭受到之抗拒的本質，來保護自身成員的利益。閉鎖於相互敵對的狀態之中，他們喪失思考完善教育之本質的機會。(Watras, 2014: 184)

Watras 認為化解爭議之道在於不同陣營之人應嘗試從敵對陣營的觀點去看待事件。與 Watras 相近，Burger（1978）嘗試從溝通的角度解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發生，指出：

一般而言衝突，或更特別而言溝通衝突，之所以發生，其部分原因是敵對的觀點對聽眾而言並不具說服力，因為聽眾有著自己強烈的對立信念。此導致兩個結果：（一）當攻擊一議題時，一個人當下的反應通常是嘗試證成自己的觀點。（二）很少有敵對者會花時間去發現反對是從何種脈絡產生以及出於何種理由。此種無法「聽見」其他的觀點與嘗試證明自己的觀點通常會加劇衝突。這可以在卡納瓦郡的爭議中獲得充分的說明。當一開始反對教科書的意見出現，雙方開始捍衛自己的立場，且疏於注意另一方的論證。教科書的支持者準備哲學的論證以捍衛彼等的觀點；教科書批評者檢視更多的教科書且尋找更多反對的篇幅。這些嘗試，在證成自己觀點的同時，亦皆忽視對手的論證。（Burger, 1978: 160）

除此之外，Hillocks（1978）亦是在探討各種見解後，從更深層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

抗議雖涉及情緒主義、種族主義、階級鬥爭，甚或來自保守團體的協助，但證據表明，抗議是從比這些解釋所指出之更為根本的議題中獲得其生命。它是有關真理與人類行為本質之截然對立觀點間的一種衝突。一端代表的是對天啟毫不遲疑的信念，認為它是通往真理最重要的通道且為人類行為的指引；另一端代表的是西方理性與實徵主義的傳統，其認為所有的知識，包含透過天啟所獲致之知識，皆受 Descartes 所謂之系統性懷疑的支配。抗議者在教科書中看見此一傳統的眾多信號，彼等將其稱之為「人文主義」。對渠等而言，存在於「蔓延的人文主義」與渠等自身價值間的衝突是絕對的、根本的重要衝突。（Hillocks, 1978: 639）

Hillocks 堪稱是將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衝突歸因於深層的價值衝突。持此種價值衝突論者尚有 Stack (2011) 以為，價值是將部落／宗族、家庭、社區與社會維繫在一起的接合劑。當價值受到威脅人們傾向於做出回應，因為價值是吾人認同的核心，價值決定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的地方感，吾人如何在世上生活、互動與勞動。

Welch (1976) 的見解與價值衝突論者相近，他是從教育哲學的角度解釋此種衝突。Welch 認為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背後存在著永恆主義 (perennialism) 與進步主義教育哲學的衝突。永恆主義的教育方式認為最重要的是應讓學生珍視文化資產，且能長遠地保存某些價值、信念、制度與技術。進步主義的教育方式則是主張應使學生以免受價值影響的方式接觸其所生活的世界，進而使學生決定如何回應社會現實。從另一角度言之，永恆主義者眼觀現在之時，卻是堅定地立足於過去，但進步主義者則是堅定地立足於現在卻放眼於未來。準是以論，有爭議的教科書採用的是進步主義的教育主張，而教科書的反對者則是採取永恆主義的立場。此外，Welch 亦從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出發，探討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社會賦予少數團體何種權利，第二個問題是代表制度是如何運作的。Welch 認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固然保障言論自由、演講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等，但這些權利究竟可延伸至何種程度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例如，少數團體可否以公費建立私人學校？如若以私人手段支助私立學校，則這些家長是否仍需納稅以支持公立學校？代表制度運作的問題則是，由人民所選舉出的各種教育行政組織的成員，在進行決策之時，究應反映其所代表之人的意見；抑或他已獲得人民的充分授權，因而有權行使個人的判斷力並做出自認最為睿智的決定？

總而言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解析之。從宗教的角度言之，反對者主張聖經與上帝為知識與權威的來源，彼等認為新教科書卻以人取代上帝的地位，這是世俗人文主義的主張。從種

族角度言之，教科書支持者擁護多元文化主義，故支持選用不同族群作者的文本。但反對者認為這些非白人著作的文法相對拙劣，且充斥著不雅用語，書中提倡的諸多論點亦有悖宗教的教義，此無關乎種族問題。如同中產階級對進步主義教育哲學有偏好一般，在卡納瓦郡不同階級亦分別擁護不同的教育立場，是故有人從階級的角度言之。從衝突的表象看，衝突涉及到宗教、階級、種族等議題，但廣義而言，彼等皆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故可說是文化的衝突。但文化除了是外顯的行為模式、社會制度、生活型態外，更是文化團體共享的概念或符號系統（Geertz, 1973），故從深層的角度言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亦可說是支撐不同生活型態之不同「學習景緻」與價值觀念間的衝突。

## 伍、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之影響

### 一、影響學生的學習權益

直接受到教科書爭議影響的當是學生。在 1974~1975 年爭議最劇烈之時，受家長的影響，估計約有二成的學生離開學校兩個月的時間，某些較極端的地區，比例甚至高達五成。當彼等重返學校時，面對著落後的學習進度，逐漸對學習失去興趣。即便是出席的學生，亦是處於緊張與恐懼的氛圍之中。當抵制的學生重新返校時，因家長的立場，學生又不自覺的形成不同陣營。準此而論，學生恐是爭議事件中苦果的直接承受者（Candor, 1976）。

Jenkinson（1986）曾嘗試從法律的觀點探討學生學習的問題。就法律面向言之，法律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同時亦保障其知與閱讀的權利。所謂的閱讀權應是學生能從學校圖書館中獲得各種不同文學型態，反映各種不同宗教、社會、政治觀點的材料。若學校或教育董事會武斷地排除其認為不妥的學習材料，恐影響學生的閱讀權。但 Jenkinson 亦指出，法律在賦予學生知的權利的同時，亦保障家長獨立行使其子女教育的權

利。在卡納瓦郡教科書事件中，兩種權力的行使其實存在著衝突。

此外，亦有學者指出由教科書爭議衍生的問題，即個人與社會間關係的問題。例如，某些家長認為當教師詢問學生對其閱讀某一故事時有何心理感受，以及教師探詢對於相關事件家人有何回應，其實已侵犯到個人的隱私權。Welch (1976) 認為家長固然有權利向學生教導自己所信奉的價值，但學生亦有權利接近其他不同的價值體系，並從中進行選擇，兩者間實亦存在著衝突。

## 二、教師對創新與爭議性議題教學的忌憚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亦對教師產生一定的壓力。某些敢勇於嘗試創新教學的教師，以及嘗試將爭議性議題放入課程中，以培育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教師，因為擔心引起家長的抗議，故放棄革新教學的嘗試。就教育史脈絡以觀之，19、20 世紀之交，美國社會的劇烈變動導致社會問題滋生，進一步促使議題中心課程的出現。其後的社會重建論者，進一步主張應以社會問題組織課程。1960 年代的課程改革運動，固然強調學科的結構，但仍有一批社會科教育工作者主張革新的社會科應以議題為中心，並讓學生學會如何作決定（鍾鴻銘，2016a，2016b）。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後，新右派勢力崛起，對此種教學方法論產生一定的衝擊。Kincheloe (1983: 32-33) 即指出：

新右派的卡納瓦郡經驗與其後有組織的作為，使得教師憚於運用創新性的教學法或處理被認為有爭議的內容。教育上回歸基礎 (back to basic) 心態的廣泛成長即是新右派活動主義的結果。

新右派新創的權力亦開始對教學方法論產生影響。某些教師對於使用「展示與演講」(show and tell) 以及其他一般初階的討論技術，卻遭到新右派組織指控破壞家庭時深感訝異，這些技術被指稱為「侵犯家庭隱私權」或「家庭權威的破壞者」。角色扮演法則被某些基本教義派的



父母指稱為有罪的。

許多教育工作者聲稱新聞中所報導之新右派的檢查作為，代表的只是基本教義派組織對課程影響的一小部分。許多教師對家長抗議的狀況有所忌憚，便自我檢視自己的內容與方法論。課堂討論與閱讀作業如若涉及爭議領域，在 1980 年代政治化的氛圍中，已經不像前幾年那麼平常。教師對可能激起社區憤怒的主題進行討論，開始感到戒慎恐懼。

事實上，回歸基礎教育運動遠非只是強調讀寫算等基礎教育而已，其所立基的道德絕對主義亦對教師的教學方法產生影響。對彼等而言，教育上如涉及道德議題並無保留彈性的餘地（Kincheloe, 1983）。在此種狀況下，價值澄清法、L. Kohlberg 的道德兩難式教學法皆受到基本教義派或新右派團體的攻擊（Provenzo, 1990）。

### 三、教科書寫作與出版的自我規訓

Apple（1993: 48）曾指出，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成為有關學校該教些什麼、由誰作決定、何種信念該引導吾人的教育計畫，最爆炸性爭議的場景之一」。就知識社會學而言，課程向來是各種勢力競逐的場域，但在此場域中家長的聲量一向不大。透過大眾媒體的廣泛報導，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喚醒美國民眾，彼等實擁有支配教科書選用的權利。自此之後，美國各地紛紛成立教科書審查組織，而且彼此相互串連，形成一種草根式的家長運動，使家長介入教科書的選擇益趨頻繁（Evans, 2011; Mason, 2009）。

Kincheloe（1983）即曾指出，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對於美國民眾對教科書行使控制權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亦指出，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統計，在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後數年，美國各地發生教科書爭議的次數大量增加。而且，

這些事件，除少部分例外，大部分皆非由非理性的極端主義者所領導，

而是由一群在哲學上採取一致立場的保守主義、理性的人民所領導。在這些戰鬥中，主要的主题便是在民主社會中，家長有權控制學校所欲教授的事物。(Kincheloe, 1983: 8)

大部分教科書抗議團體都與基本教義派有關，在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中，曾應 Moore 女士之邀到卡納瓦郡聲援的 Gabler 夫婦，即是著名的基本教義派教科書抗議者。Gabler 夫婦從 1960 年代初期即開始檢視教科書內容，1973 年 Gabler 夫婦於德州 (Texas) 創立「教育研究分析者」(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的非營利組織，從事教科書內容的分析。不久之後，其影響力便遍及全美國。至 1970 年代晚期，該組織已有 6 名職員，每天約需處理 20 至 50 封的信件。在從事教科書檢查時，該組織將聖經作為權威的來源 (Provenzo, 1990)。除宗教議題外，Gabler 夫婦亦關注性教育、拙劣的文法、不愛國與反資本主義的教科書內容 (Kincheloe, 1983)。由於認為在現行教科書的選擇程序中家長難以發揮影響力，故二氏主張各地的家長應透過教科書的檢查與抗議對教科書的選擇施加影響力。Gabler 與 Gabler (1982: 96) 曾謂：

我們試著將教科書的選擇從極小的少數群體所為之封閉之門的後面加以取出，而後對著一般大眾開放，使彼等得以在付出金錢之前，看見欲購之物為何。

上述之言，頗能代表彼等積極提倡教科書檢查的目的。Gabler 夫婦與傳統基金會等基本教義派團體甚至出版參考著作，教導家長如何組織抗議團體進行教科書抗議 (Provenzo, 1990)。

Moffett (1988) 是爭議事件中教科書的作者及編輯者，其教科書因倡導多元文化主義與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語言，在爭議事件中成為抗議者舉證的來源。在事後他亦出版《山中風暴：檢查、衝突與意識的個案研究》(*Storm in the Mountains: A Case Study of Censorship, Conflict, and Consciousness*) 乙書，反思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過程與結果。他以為，教科書抗議的

結果是某些品質良好的教科書從市場上消失。因為事件之後，沒有教科書出版商膽敢向學校推銷受到詆毀或具有相同觀點的教科書，即便大部分被認為有問題的教科書最終獲准重返教室與圖書館，但因教育人員為免橫生枝節盡量避免採用，故在市場上早已乏人問津。易言之，即便教科書戰爭已結束，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戒慎恐懼的氛圍。雖說就行政程序而言，這些教科書已獲認可並恢復使用，但卻很難再接到新的訂單。取而代之的是立場溫和的作者及經過充分消毒的課程主題與內容。甚至某些卡納瓦郡的學校立場更為保守，為免再生爭議，彼等轉而重新採用 1940 年代所曾使用過的教科書系列（Foerstel, 2002）。

#### 四、預示新右派勢力的崛起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影響並非僅侷限於教育領域，由於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此一新聞事件成為全國新聞焦點。迨至晚近，亦偶有學者與新聞媒體進行事件回顧，尤其是將卡納瓦郡教科書事件與晚近美國的政治進行連結。有些人將其視為現代保守主義或新右派崛起的代表性事件。亦有當時事件的主要參與者將此一事件視為當代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的起源（Kincheloe, 1983; Mason, 2009, 2011; Stack, 2011）。誠然，要為某些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尋找一確切起源點有其困難，但此一事件確實對美國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過實質的影響。Kincheloe（1983: 7）即曾指出：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替美國政治景象與教育中的某些深度變革做好準備。其中出現了與今日被稱為新右派的各種保守團體相關的議題。在 1974 年抗爭之前，保守主義與基本教義派的父母感到無力，彼等自視為自由的、道德敗壞社會的受害者，此種社會將彼等有關於宗教、道德與社會行為的舊式態度加以遺棄。卡納瓦郡中反教科書勢力的成功，給全國保守主義者新的自信感，使其相信能控制自身的命運，且能阻擋感知到之非道德感的浪潮，彼等認為此浪潮可能吞噬其子女。

此外，McHenry（2006: vi）亦曾指出：

在新右派運動初期，教科書爭議為迅速增長的運動提供催化劑：為有需要變革的觀念增添更多的糧秣。卡納瓦郡的家長在 1970 年代的特殊時期，也就是成長中的美國保守主義處於關鍵點之時，起而反抗。劇烈的衝撞、新民粹主義、新右派及新基督教右派的興趣，皆在 1974 年卡納瓦郡中，以或此或彼的某種形式有所呈現。

Mason（2009: 55）曾謂，教科書抗議者：

並非文化上孤立的、依附於過去的反現代傳統主義者。相反地，彼等象徵著各種保守主義與右翼行動的興起。

易言之，教科書抗議者並非單純主張守舊的傳統主義者，這些抗議者有其一致的共同立場。投身教科書抗議的各地組織，除了 Gabler 夫婦的「教育研究分析者」外，尚包括「傳統基金會」、「約翰·伯奇社團」（John Birch Society）、「全國家長聯盟」（National Parents League）等右派團體（Parker, 1975），由此足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的確為美國新右派的興起搭建歷史舞臺。在卡納瓦郡之後的教科書抗議，其訴求基本上與卡納瓦郡抗議者相去不遠。若與美國其他教科書爭議事件相較，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的獨特之處，在於有嚴重的暴力衝突發生（Fikes, 1991）。這些被歸類為極端基本教義派或新右派的教科書抗議事件亦是美國「文化戰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Hunter, 1991; Zimmerman, 2002）。彼等控訴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者透過教科書教導下一代文化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懷疑論等價值觀，並稱這些主張為世俗人文主義。世俗人文主義在 1970 年代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前後數年中成為流行用語，經過傳統基金會等保守團體刊物的流傳而廣泛被使用（Mason, 2011）。

## 陸、結論

課程史學者 Kliebard (1989: 2) 曾謂：「課程的中心問題需要價值決定」。質言之，課程或教科書是選擇性傳統的一部分，彼等恆處於特定時空脈絡之中，必然會反映時空的特定價值 (Provenzo et al., 2011)。民主社會往往存在著多元價值，在多元價值中進行選擇便可能發生價值上的衝突。由於教科書是課程內容的重要載具，且能對學生產生重要影響，是以，教科書便可能成為課程之爭的重要場域，教科書亦可能因此由毫無生氣的書面文件轉變為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 (Herlihy, 1992)。Provenzo 等人 (2011: 1) 認為：「在美國，教科書之內容較其他文化更為保守」。但即便具備保守性格，因其影響深遠，它亦容易引起爭議。此一狀況不獨美國為然，其他國度亦可能發生，特別是民主國家更是如此。

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涉及到教科書政策背後的教育哲學、教科書選用過程的參與、教科書的內容、教育行政人員應對爭議的處置等面向。1960 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等，造就的是偏左的政治氛圍，於是倡導文化相對論的多元文化教育、重視「他者」(the Other) 或少數群體權益的聲浪開始在教育領域興起。在經歷社會既有基礎遭到動搖的 10 年後，歷史又開始辯證性的發展，蟄伏的保守力量藉由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展開反攻。新右派將自由主義的教育主張上推至 J. Dewey、進步主義運動，以及人文主義教育 (Park, 1980)。故廣義而言，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亦是長期以來美國兩股對立教育思潮，即進步主義與永恆主義衝突的翻版。

其次，就教科書選用而言，長期以來反映的是菁英人士與專業人士的觀點，一般家長難有置喙的餘地。故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反映出家長意欲共同享有教科書，甚至是教育控制的權力。在民粹主義盛行的今日，如何讓專業人士與家長共同攜手合作，讓下一代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是臺灣教育工作者乃至整體臺灣社會應加深思的問題。晚近臺灣社會要求就性教育內容進行公投，就某種面向而言，亦是家長希望對課程

內容有更大影響力的顯現。但是在公投前，教育專家與關心相關議題的公民，或是多元文化主義與傳統主義兩種陣營間，似仍欠缺適當的溝通與意見交流，以致雙方立場堅決，互不肯認對方。文化多元主義者，往往無視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婚姻觀，亦是多元中的一元，故常譏諷彼等為「恐同症」、「保守者」。倡議傳統價值者，則又把多元觀點視為對神聖傳統的褻瀆，不欲子女對其接觸與理解。為了擺脫如是的困境，除了加強意見的溝通交流外，教科書的編寫亦不宜採非此即彼的方式，而是應採多元觀點並存共好的方式敘寫，並且讓學生有判斷、選擇，乃至嘗試採取立場的機會。其次，與美國教科書選用制度相較，臺灣的家長在教科書選用過程中的地位並不明確。如能在法律規範中賦予更明確的地位與作用，不僅象徵家長有權參與教科書的選用，當不同的意見對立時，溝通的渠道亦較容易建立。

在面對教科書爭議時，教育行政人員的處置方式，亦是影響爭議發展的重要因素。Young（1974: 267）曾指出：「爭議持續得越久，議題便會變得更多樣化與複雜，同時益發不可能解決問題」。卡納瓦郡教科書事件發生之初，教育行政人員未能及時處置，事件一旦擴大發展，教科書事件便淪為各方勢力展演的舞臺，使得問題趨於複雜。教科書的內容往往反映特定的意識型態，當其涉及政治議題時，更容易引來政治團體的介入，增加其爭議的深度與廣度。教科書爭議事件最終亦可能轉變為政治事件。由於特殊的歷史之故，此種狀況更易在臺灣發生。為免課綱修制訂或教科書的選用滋生事端，各級教育行政人員對可能肇生爭議的課程內容或行政決定過程應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切勿讓爭議的星星之火產生燎原之勢。晚近的課綱爭議，在行政決策過程與行政處置與應對方面確有商榷之處，值得吾人反省檢討，並思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之時，應如何合理應對方能避免重蹈覆轍（歐用生，2019）。

總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可以從諸多面向進行探討。就教科書內容而言，涉及宗教議題、種族議題，乃至多元文化教育問題，就教育行

政面向而言，涉及教科書選用委員會代表性問題、教育與課程決定權的分配、親師溝通問題。此外，尚有媒體在爭議中的角色，課程與政治利益團體的介入，亦是值得吾人細加深入探究的問題。除上述問題外，另有一些更深層的問題，亦待學界釐清。例如，在爭議過程中，亦有家長主張兒童歸屬於父母，是故學校無權教導挑戰父母價值的課程或教學材料（Candor, 1976）。當然，許多教科書爭議事件涉及的是教育哲學長期爭辯的問題，即教育究應傳遞傳統的文化價值，還是應成為社會變革的催化者。上述問題皆非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所獨具，而是各種教科書爭議背後可能普遍存在的問題，皆值得吾人進一步細加探討。近年來，臺灣課程相關的爭議已逐漸從傳統的政治議題，逐漸擴及至性別等其他議題，甚至對課程內容感興趣的利益團體亦逐漸增加，如何從相關事例中汲取經驗與教訓，是教育工作者應加以重視的課題。

## 參考文獻

- 歐用生（2019）。黑暗中書寫：歐用生的學思旅程。臺北市：師大書苑。
- 鍾鴻銘（2006）。H. Rugg 教科書爭議事件。《教育研究集刊》，52（3），103-139。
- 鍾鴻銘（2016a）。社會科中的議題中心課程：歷史性探究。《課程與教學季刊》，19（2），103-128。
- 鍾鴻銘（2016b）。T. J. Jones 與《1916 社會科委員會報告書》對社會科緣起之歷史意義探究。《教育研究集刊》，62（3），35-71。
- Adler, L., & Tellez, K. (1992). Curriculum challenge from the religious right: The impressions reading series. *Urban Education*, 27(2), 152-173.
- Apple, M. W. (1993).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illings, D., & Goldman, R. (1979). Comment on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Social Forces*, 57(4), 1393-1398.
- Burger, R. H. (1978).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48(2), 143-162.
- Burruss, L. (1989). *Battle of the books: Literary censorship in the public schools, 1950-1985*. Metuchen, NJ: The Scarecrow Press.
- Candor, C. A. (1976). *A history of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April 1974-April*

- 197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Blacksburg, VA.
- Clark, T. (1975). The West Virginia textbook controversy. *Social Education*, 39(4), 216-219.
- Clelland, D. A., & Page, A. L. (1980). Kanawha county revisited: Reply to Billings and Goldman. *Social Forces*, 59(1), 281-284.
- Crawford, K. (2011). Books versus 'the book': The 1974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 4(1), 51-72.
- Dorn, C. (2008). "Treason in the textbooks": Reinterpreting the Harold Rugg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the context of wartime schooling. *Paedagogica Historica*, 44(4), 457-479.
- Evans, R. W. (2007). *This happened in America: Harold Rugg and the censure of social studies*.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 Evans, R. W. (2011).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school reform: How curriculum politics and entrenched dilemmas have diverted us from democrac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Evans, R. W. (2012). Harold Rugg and educating about social issues. In S. Totten & J. E. Pedersen (Eds.), *Educating about issues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A critic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Vol. 1, pp. 93-114).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 Faigley, L. L. (1975). What happened in Kanawha county? *The English Journal*, 64(5), 7-9.
- Fikes, R. (1991). *Book censorship, social dynamics, and the education-library establishment's response to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Retrieved from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338251.pdf>
- Foerstel, H. N. (2002). *Banned in the USA: A reference guide to book censorship in schools and public libraries* (Rev. & expanded 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Foerstel, H. N. (2013). *Studied ignorance: How curricular censorship and textbook selection are dumbing down American education*.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 Gabler, M., & Gabler, N. (1982). Response: Mind control through textbooks. *Phi Delta Kappan*, 64(2), 96.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iordano, G. (2003). *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 wars: A history of advocacy and opposition*.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Goode, D. J. (1984). *A study of values and attitudes in a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Kanawha county, West Virginia: An overt act of opposition to schoo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
- Hartman, A. (2013). "A Trojan horse for social engineering": The curriculum wars in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5(1), 114-136.
- Herlihy, J. G. (1992). The nature of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J. G. Herlihy (Ed.),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3-13). Norwood, NY: Ablex.
- Humphreys, J. (1976). Textbook war in West Virginia. *Dissent, Spring*, 164-170.
- Hillocks, G. (1978). Books and bombs: 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the Kanawha county book protest. *The School Review*, 86(4), 632-654.
- Hunter, J. D. (1991).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Jenkinson, E. B. (1986). *The schoolbook protest movement: 40 questions & answers*. Bloomington, IN: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Kincheloe, J. L. (1983). *Understanding the new right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 Bloomington, IN: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Kliebard, H. M. (1989).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curriculum.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 5(1), 1-5.
- Mason, C. (2009). *Reading Appalachia from left to right: Conservatives and the 1974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son, C. (2011). From textbooks to tea parties: An Appalachian antecedent of anti-Obama rebellion. *West Virginia History*, 5(2), 1-27.
- McHenry, J. J. (2006). *Silent, no more: The 1974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 McNearney, C. L. (1975).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Religious Education*, 70(5), 519-540.
- Means, D. (2010). *War in Kanawha county: School textbook protest in West Virginia in 1974*. Bloomington, IN: iUniverse.
- Moffett, J. (1988). *Storm in the mountains: A case study of censorship, conflict, and consciousness*.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75). *Kanawha county, West Virginia: A textbook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Washington, DC: Author.
- Page, A. L., & Clelland, D. A. (1978).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A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life style concern. *Social Forces*, 57(1), 265-81.
- Park, C. J. (1980). Preachers, politics, and public education: A review of right-wing pressures against public schooling in America. *The Phi Delta Kappan*, 61(9), 608-612.
- Parker, F. (1975).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Kanawha county*. Bloomington, IN: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Pincus, F. L. (1985). Book banning and the new right: Censorship in the public schools. *The Educational Forum*, 49(1), 7-21.
- Priest, K. C. (2010). *Protester voices: The 1974 textbook tea party*. Poca, WV: Praying Mantis.
- Provenzo, E. F. (1990).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the public school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rovenzo, E. F., Shaver, A. N., & Bello, M. C. (2011). Introduction. In E. F. Provenzo, A. N. Shaver, & M. C. Bello (Eds.), *The textbook as discours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American schoolbooks* (pp. 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eltzer, C. (1974). West Virginia book war: A confusion of goals. *The Nation*, 219(14), 430-435.
- Stack, S. F. (2011, March).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war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Charleston, SC.
- Watras, J. (1975). The textbook dispute in West Virginia: A new form of oppress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33(1), 21-23.
- Watras, J. (2014). Landscapes of learning, West Virginia's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the culture wars.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Journal*, 41(1), 183-198.

- Welch, E. H. (1976). Textbook crisis in West Virginia. *Educational Forum*, 41(1), 20-32.
- Woodward, A., & Elliott, D. L. (1990). Textbook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In D. L. Elliott & A. Woodward (Eds.), *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46-161). Chicago, IL: NSSE.
- Young, K. (1974). School storm centers: Charleston. *The Phi Delta Kappan*, 56(4), 262-267.
- Zimmerman, J. (2002). *Whose America? Culture wars in public scho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